

网络立法，保护公民权益是核心

社会热点

凭着世界第一的网民数量和增长最快的网络经济,中国已成为“网络大国”。而与此同时,由于法律的不完善,网络成为侵害公民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合法权益的集散地。所以,完善网络立法可谓十分迫切,而这种立法,保护公民权益是核心。

我国现阶段的立法缺乏对网络隐私范围的具体化,没有对网民“核

心隐私”进行明确界定,导致网络公司可以通过“网络协议”的方式肆意侵害网民合法权益。所谓“核心隐私”就是那些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通过民事手段获取的信息。按照欧盟和我国台湾地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包括五个方面:基因、性生活、犯罪前科、医疗健康、健康检查。除此以外的个人隐私搜集也要受到一定限制。

按照台湾规定,将“依据契约”和“公共利益”作为搜集信息的豁免,这并不是给非法的“人肉搜索”开了口子,而是强调了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将“依据契约”作为网民隐私搜集的

豁免,是因为在台湾那些涉及消费者权益和网民公共事务的“网民协议”必须要经过政府事先审核,这就避免了网络公司利用不法契约的形式擅自搜集网民隐私的危险。所以,我们的立法,在强调保护网络隐私的同时,也需将那些涉及网民个人信息方面的“网络协议”纳入到政府事先审查范围。

保护网民的“安宁权”是维护网民权益的重点。安宁权是指网民有权利享受避免被打扰的“安宁”。现阶段安宁权并没有进入到我国法律体系之中,导致网络邮箱广告信息不断、使用网络工具随时会被“弹出式”广告打断、手机每天都要接收垃

圾短信等。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地区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网民的“安宁权”,规定一旦网民发现自己生活的安宁可能被打扰,法律就赋予他“拒绝”的权利,如果发送者仍执意继续发送这些信息的话,那么将会面临包括刑事处罚在内的法律责任。虽然将安宁权“入法”可能会导致网络公司广告收益的下降,但是这对于净化网络环境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国网民的低龄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很多孩子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因此网络立法还应突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额外保护。因为我国对未成年人网络

权益保护专门立法的缺位,客观上造成了很多孩子在没有认知能力以前就受到网络的不良影响和侵害。

在立法上,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应该至少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突出家长的监护权,家长有权通过实名申请参与对子女游戏时间和方式的监管;二是明确网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一方面,对于可能存在“血腥”、“暴力”等场面的视频、游戏、文字等设立身份核实进入制度,未成年人不得进入,另一方面,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应处于最高级别,在使用他们的姓名、肖像、隐私等个人信息之时要更为谨慎。

(转载自《新京报》)

一家之言

高铁也要有低价票

□ 毛建国

京广高铁将在年底开通,北京和广州之间的距离,将缩短为 8 个小时。然而,对于那些对速度要求不高的人来说,好消息来临之前却还要先听一个“噩耗”:普客停运。

一直以来,铁道部对于铁路运输的发展思路是“货运重载化、客运快速化”。这并不是说,因为一些人对速度要求不高,所以就要迁就,明明可以提速却要保持低速。这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也不符合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说,普客为高铁所代替,是为必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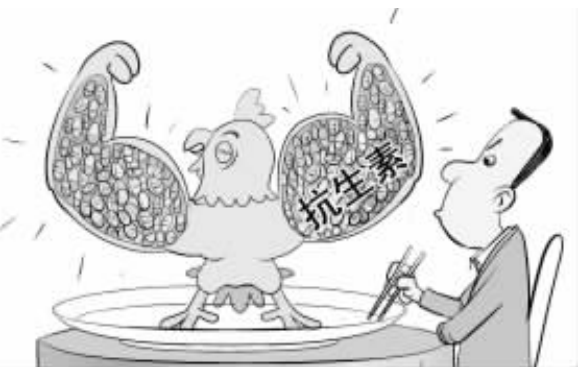
但需要指出的是,普客停运之所以被一些人视为“噩耗”,重点不在速度而在价格。普客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是速度而是价格。拿此次被停运的北京西至郑州 D133/4 次车来说,开行时间为 5 小时 41 分钟,车票价格一等座为 243 元,二等座为 202 元。如果北京到郑州的高铁开通的话,时间可以缩短为 2 个小时,虽然价格没有确定,但参照已经开通的武广高铁,估计票价将是原来的 2 倍左右。急剧上涨的票价成本,对于一些低收入群体,显然是难以承受之重。如果高速不以高价为前提,高铁票价能够保持原来的相对低价,即使略有提高,相信也没有多少人会反对普客停运。可一旦高速以高价为前提,那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必然是一个“噩耗”。

社会并不反对铁路提速,并不反对高铁取代普客,反对的只是铁路提价,担心的是困难群体“坐不起”。而且,这两者之间也并非不可调和,只要铁道部多讲讲“穷人经济学”,完全可以兼顾到困难群体的需要。

众所周知,现在航班打折很厉害,一些小航空公司的票价很有吸引力。高铁也可以针对困难群体,推出一些特价票。现在的高铁不仅速度快,而且配套好。在舒适度和票价之间,困难群体宁愿选择低价。就好比同一个楼盘可以有不同的房价一样,同一个高铁也可以有不同的票价。

铁路部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车次所有的车厢,都搞成同样的高标准,完全可以在一些车次一些车厢,适当降低配套档次。以此,推出多元化的价格,满足多层次的需求。那些收入高的,可以花费高价,选择豪华车厢;而收入低的,则以较少的支出,选择普通车厢。

“药膳鸡”



鸡”,不能仅仅是约谈问题企业,排查问题食品,还应该对问题企业进行更严厉的处罚,比如,停业整顿、依法追究刑责。否则,很难让问题企业深刻反省、改正错误。

另外,中国消费者也要学会“用脚投票”,拒绝消费某些问题“洋快餐”。只有消费者、监管者同时对问题食品说“不”,问题“速生鸡”才有可能退出市场。

生素超标,不仅隐瞒不报而且没有召回。作为一家遍布全球的知名餐饮巨头,肯德基如此漠视公众的知情权、健康权,显然让人非常失望,试问:肯德基给消费者“吃药”究竟“吃”了多久,是否仅存在于中国?

而且,地方监管缺失也让人大为吃惊。上海食药监局下属的食药检验所承认,2010 至 2011 年山东六和鸡先后 8 次被检出抗生素残留超标,检测项目中并不包含激素检测。这说明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其一,该检验所发现问题后却没有向社会公布;其二,检测报告只向委托检测的企业提供,不客气地说,检验所只管赚钱不管消费者健康;其三,检测项目不完整,不包含激素检测。

要想真正治理问题“速成

医院逼药商“返点”给医改提了一个醒

□ 晏扬

江苏苏州的药商近日报,当地医改试点医院要求其按销售额 5% 到 20% 的比例“返点”,药商先把钱“捐”给当地慈善基金会,慈善会再把钱划给卫生局,卫生局最后将钱分配给医院。据悉,当地政府部门统一安排医院和药商的谈判,要求药商返利。医院工作人员称,医院向药商要钱,是因为政府拨款不足。

药商“返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药商向医院推销药品,须私下给相关人员红包、回扣,这向来是医疗行业通行的“潜规则”。苏州的“奇特”之处在于,将见不得人的“潜规则”变成堂而皇之的“明规则”,将违法行为公然变成政府部门主导的行为,政府部门不打击医药回扣,反而试图将其“合法化”。政府部门和

医院联手,药商只能乖乖就范,说是谈判,其实哪有商量的余地——你不返利,人家不用你的药。

“潜规则”何以变成“明规则”?很简单,因为改革!众所周知,实行“医药分开”是医改的重头戏,即取消医院药品加成,降低药价,同时提高“医价”(医疗服务价格),以弥补医院收入上的损失。苏州医改试点医院的“医价”提上去了,但仍念念不忘要从药品中渔利,不允许药品加成,他们便转而向药商索要返利,返利比例与药品加成大致相当。如此,“医药分开”不只是让医院“早涝保收”,还让他们凭空多了一份收入。

有人可能想,反正医院的药品加成取消了,医院多赚钱还是药商多赚钱,他们之间的利益争斗,与患者何干?其实不然。羊毛最终出在羊

身上,医院与药商打架,受伤的还是患者。其一,药商不会做亏本买卖,返利显然会成为药品成本的一部分,从而推高药价;其二,返利使得药品生产和经营利润下降,为保住利润,药企可能偷工减料,导致药品质量下降;其三,返利可能使一部分药品无利可图,药商不经销,药企不生产,从而导致“救命药”和便宜药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各种“新贵”药品。

苏州市的情况无疑给“医药分开”改革提了一个醒:医院的逐利冲动并不会因“医价”提高而收敛。一些地方所搞的“医药分开”改革,其实是一种伪改革、真创收,改革的真正目标不是减轻患者负担,而是趁机捞一把,增加医院的收入。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把医改当作“卸包袱”的契机,不愿增加医疗支出,对

孩子不是怪物,抛弃孩子可耻

□ 张田勘

短短两个月来,重庆市长寿区农妇张芳经历了人生中的大喜大悲:31 岁的她欣喜地生下了镁棋,但不幸的是娃娃却很快被检查出是两性畸形;更让她难过的是,丈夫雷嵩因嫌弃镁棋,在孩子生下仅 37 天,就与她离婚了。

笔者想告诉雷嵩,他们的孩子

根本就不是“怪物”,相反如同其他孩子一样,是上天送给他们的珍贵礼物,不仅同其他孩子一样正常,而且有可能是一名聪明可爱的人才。

事实上,在两性畸形中,大多数为假两性畸形,包括男性假两性畸形和女性假两性畸形两种。在假两性畸形中,男性假两性畸形最为常见。假两性畸形更容易通过医疗手段,如手术治疗消除畸形,恢复

其本来的真实性别。这可以在随后的生长发育中以性腺为标准,若是体内有睾丸的,可以恢复其男性性别;若是体内有卵巢的,可以恢复其女儿身。

即便是真两性畸形,也可以根据孩子成长时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尊重孩子的意愿和心理感受,为其做手术矫治,成为或是男或是女的单一性别。更何况今天很

多并非两性畸形的人都可以通过手术进行变性。

所以,任何孩子都不是怪物,而是爱的结晶和上天赐予的珍贵礼物。她(他)活着,父母应爱她(他)、抚养她(他);她(他)死后,父母要怀念她(他)。如果雷嵩和类似雷嵩的人认为自己有残疾的孩子是怪物,那么,他们的心灵才长了怪物。